

当代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分离与总体性危机

——基于南希·弗雷泽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评析

周咏春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5日

摘要

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呈现出经济、生态、政治、社会等多维度交织的特征, 而传统批判理论却难以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美国批判理论家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通过对资本主义概念的重新定义, 为理解当代危机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南希·弗雷泽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突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济主义”局限, 通过对“经济前景”与“非经济背景”关系的深度剖析, 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化社会秩序的内在危机结构。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 深入探析阐释弗雷泽关于资本主义四重分离的理论框架, 分析这些“前景”与“背景”的制度性分离如何构成资本主义的危机根源, 并对弗雷泽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

关键词

南希·弗雷泽, 资本主义危机, 四重分离, 批判

Institutional Separation and Systemic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 Analysis Based on Nancy Fraser'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Yongchun Zhou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Received: April 8, 2026; accepted: April 28, 2026; published: May 15, 2026

Abstract

The crise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exhibit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twining of economic, ecolog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yet traditional critical theories struggle to provide effective

analytical tools. American critical theorist Nancy Fraser, by redefining the concept of capitalism, offers a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rises. Fraser's theory of capitalist crisis transcends the "economistic"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ritique.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ic foreground" and the "non-economic background," she reveals the inherent crisis structure of capitalism as an institutionalized social order.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interprets Fraser's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quadruple separation of capitalism, analyzing how these institutional separations between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constitute the root causes of capitalist crises, while offering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Fraser's theory.

Keywords

Nancy Fraser, Capitalist Crisis, Quadruple Separation, Critiqu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今资本主义正处于动荡时期，金融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此起彼伏。而这些都指向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又当如何理解 21 世纪资本主义的本质？面对这一时代之问，美国批判理论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提供了一种独具洞见的分析范式。她借鉴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构建“前景-背景”的方法论视域，将资本主义界定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揭示了经济前台与非经济背景之间的四重制度性分离——生产与再生产、人类与自然、经济与政治、剥削与征用。这些分离构成了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根源，而围绕边界的捍卫与挑战则成为当代社会斗争的主要内容。弗雷泽的理论努力代表了对传统批判理论宏大叙事的复兴，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深化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发展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2. 资本主义概念的重构：从经济体系到制度化社会秩序

弗雷泽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对资本主义概念本身的重构。在她看来，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传统马克思主义，都未能充分把握资本主义的完整本质——前者将资本主义简化为市场经济的理想类型，后者虽揭示阶级剥削却往往陷入经济主义的狭隘视界。弗雷泽主张以一种“扩展的资本主义观”取而代之，这一理论努力始于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方法的创造性转化。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1], p. 20)弗雷泽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方法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末尾带领我们从交换转向生产，然后从生产转向原始积累。在每种情况下，其效果都是使曾被遮蔽的东西变得明白可见”[2]。如果说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剥削的前台故事，那么原始积累所展现的则是“剥夺式积累”的幕后叙事——前者通过法律认可的劳动合同形式进行资本积累，后者则是残酷的公然掠夺，“是直接使用暴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 p. 61)，完全撕下了平等交换的面纱。弗雷泽由此提炼出“前景-背景”的方法论视域：要理解资本主义，不能仅停留于经济交换和劳动剥削的表面，而必须

深入探寻使这些经济活动得以可能的非经济条件。

基于这一方法论，弗雷泽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四个核心特征：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阶级分化、劳动力的商品化、资本无限积累的动力机制、市场的中心地位。[3]但她强调，这些经济特征本身不足以构成资本主义的完整图景，因为经济领域并非自足的封闭系统，而是深深依赖于一系列非经济的“背景”条件：第一，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无酬劳动——家务、育儿、照护等维系人类生存和社会纽带的活动，为有偿劳动提供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第二，非人自然提供的“免费礼物”——作为原材料和能源的供应源，同时充当吸收生产废物的“水槽”；第三，公共政治权力的制度保障——通过保证产权、执行合同、维持秩序等方式为市场运作奠定基础；第四，对种族化人群的暴力征用——以剥夺方式获取的财富与以剥削方式榨取的剩余价值共同构成资本积累的来源。弗雷泽将这些背景条件称作资本主义的“隐蔽居所”(hidden abodes)([4], p. 7)。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1], p. 21)，这种分离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更是涵盖社会、政治、自然等多重维度的制度性区隔。

弗雷泽的核心洞见在于，资本主义并非简单地“利用”这些非经济条件，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它们与经济领域分离开来，同时隐匿经济对它们的实际依赖。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了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人类社会与非人自然、私人经济与公共权力、自由剥削与暴力征用这一系列结构性划分，构成了资本主义独特的‘地形学’特征。”弗雷泽将这种矛盾关系概括为“分离-依赖-否认-失稳”的4D模型，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自我颠覆倾向——经济前台与非经济背景既相互分离又相互依赖，资本既从背景条件中汲取养分又矢口否认其价值，最终在无限积累的驱动下破坏自身赖以生存的基础。

由此，弗雷泽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制)，而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institutionalized social order)([4], pp. 8-42)。其中经济活动和关系的领域被显著地划分出来，并与其他非经济的领域相区分，前者依赖于后者，但后者却被否认。这一概念的要义在于：第一，资本主义不仅是经济体系，更是涵盖性别、种族、生态、政治等多个维度的总体性社会形态；第二，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在于通过制度性分离建构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的特定关系；第三，资本主义的危机不能简单还原为经济危机，而必须理解为多重危机倾向的总体爆发。这一扩展的资本主义观，既超越了经济主义的狭隘视界，又避免了后结构主义将一切议题碎片化的倾向，为系统性的社会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弗雷泽对资本主义概念的重构，体现了一种“去正统化”的理论立场。她无意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主张在21世纪条件下以“扩大化”为原则对资本主义进行原初追问。这一理论努力与卢卡奇对辩证方法的强调形成呼应——“我们所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一部‘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5]弗雷泽正是通过回到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将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判范式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把握。

3. 制度性分离的四重维度：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

弗雷泽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分析，集中体现于对四重分离的揭示。每一重分离都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内在规定性，同时也埋下了相应危机的结构性根源。

第一，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弗雷泽所指的社会再生产是生产和维持社会关系的互动模式，包括劳动力的再生产和文化、主体间性的创造与重塑，是使人同时作为自然人和人社会人得以生存和交往的社会伦理材料。[6]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与再生产并未被严格区分，二者共同嵌入相对统一的共同体生活形式。而资本主义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统一。生产性的有偿劳动与再生产的无偿劳动被制度性地分割开来，前者被赋予经济价值并成为社会承认的“工作”，后者则被贬入私人领域的阴影之中，其社会重要

性被系统性地掩盖。这一分离内在地蕴含着性别统治的逻辑——从事再生产劳动的女性在地位上从属于赚取现金的男性工人，性别二元论和异性恋规范由此得到巩固。然而，社会再生产恰恰是资本持续积累的必要条件，没有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和代际再生产，就没有可供剥削的劳动者。资本主义因此陷入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依赖于再生产的投入，另一方面又在无限积累的驱动下不断吞噬再生产所需的资源和能量，导致“照护危机” (crisis of care) 的周期性爆发。

第二，人类与自然的分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1], pp. 79-580) 弗雷泽在此基础上指出，资本主义在结构上开创了自然与经济的截然区分。资本将自然视为一个无限可供开采的原材料供应场所，同时将其作为吸收生产废物的“水槽”。自然的价值既被预设——作为资本积累不可或缺的免费馈赠，又被否定——资本拒绝承担修复和再生产的成本。这种分离开启了被误称为“人类世”的全新地质时代。弗雷泽强调，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并非抽象的“人类活动”，而是具体的资本逻辑。与马克思时代主要以圈地运动形式呈现的自然市场化不同，当代资本主义以科技创新方式“制造新的自然现象”，深入自然的“内部”改变其内在语法。从化石能源的大规模开采到基因技术的商业化应用，资本对自然的吞噬不仅没有缓解，反而以更为隐蔽和彻底的方式加剧。生态危机由此成为资本主义无法回避的结构性后果。

第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有效地融合在一起——领主国家或地方政权同时掌控着对土地、劳动和商业的控制权。资本主义的出现将二者逐步分割开来。组织生产的权力被私有化并移交给资本，管理非经济秩序的任务则落到公共权力身上。“资本的统治是建立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而雇佣劳动又是以资本家对土地、劳动条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为前提的”。 ([1], pp. 20-822) 现代领土国家通过法律制度为市场交易创造经济空间，保证产权、执行合同、解决纠纷，同时创造和保证了货币体系。然而，资本在依赖公共权力的同时，又天然憎恨任何对其扩张的限制，随时准备通过逃税、削弱监管、离岸业务或俘获公共机构来破坏这种权力。这一矛盾在地缘政治层面同样展开：一方面是国内与国际之间“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割裂，另一方面是强权中心与边缘地带的对抗。随着新自由主义对政治能力的持续侵蚀，民主政治日益空心化，政治霸权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显著症状。

第四，剥削与征用的分离。弗雷泽区分了资本积累的两种机制：剥削是在契约幌子下对自由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榨取，征用则是以粗暴方式对种族化臣民的财产和人身进行掠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论述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征服、奴役、劫掠、杀戮”的暴力作用，但弗雷泽强调征用并非仅限于资本的初始阶段，而是贯穿资本主义始终的持续过程。剥削以“自由合同”和“工资形式”为媒介，对应着享有公民权利的自由人；征用则以公开的暴力为基础，对应着不受政治保护的依附性存在。这两种机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制度性分离，同时又在资本积累的实际过程中相互交织——被征用人群的种族化臣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被剥削人群获得自由的“隐性条件”。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征用以新的形式普遍化——不仅针对传统种族化人群，还通过掠夺性债务等方式侵蚀原本被剥削的公民 - 工人的生存空间。剥削与征用的混合体日益成为常态，种族压迫与阶级剥削相互强化，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不稳定的深层根源。

这四重分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共同构成资本主义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弗雷泽的理论贡献在于，她揭示了资本主义不仅是阶级剥削的经济制度，更是沿着性别、种族、生态、政治多重轴线建立起的统治秩序。每一种分离都对应着一种非正义的等级关系，同时也埋下了相应危机的结构性根源。正是这些制度性分离的总体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多维性和系统性。

4. 危机倾向的历史展开：资本主义四阶段的结构演进

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还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秩序。弗雷泽强调，四重分离并非一成不变的给定结构，而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变化而发生性地生成和演变。在此意义上，弗雷泽将资本主义归纳为商业资本主义、竞争性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管理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均是经济前景与非经济背景之间共生关系的具体展开，也是资本主义运作的客观样态的呈现[7]。

在商业资本主义阶段(16~18世纪)，经济与政治尚未完全分离。领土国家内外部分别由道德规范和价值原则支配。对内实行政治权力对商业的管辖，对外则在长途贸易中奉行资本的价值逻辑。这种内外的分裂随着国际价值逻辑向国内渗透和统治者财政需求的扩大，最终催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再生产活动仍主要整合在家庭、教会、习俗等传统模式之中，相对不受价值规律支配。受17世纪科学革命影响的机械自然观将“自然”与“人类”看作对立双方，自然在认识论上被外部化，为后续的生态榨取奠定观念基础。资本原始积累主要依靠欧洲中心地带的圈地运动和边缘地带的掠夺征用，种族化的臣服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初步形成。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19世纪至20世纪初)，经济与政治的制度分离得以确立。欧洲主要国家构建了形式上独立运作的经济领域，公共权力被弱化为市场秩序的守护者。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空间化——工厂与家庭成为截然不同的领域，“生产性”的有偿劳动与“生殖性”的无偿劳动被明确分割，性别差异在此过程中被强化和制度化。自然被商品逻辑内化，生产功能由生物质能源转向煤炭等化石能源，开启了“体外”能量转换的新纪元。中心国家对边缘地区的征服和掠夺加剧，剥削与征用在空间上被分割却又在功能上相互支撑。被剥削的白人男性工人获得有限公民权，被征用的种族化人群则持续处于无保护状态。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各类运动斗争都在这一阶段相继爆发。

在国家管理资本主义阶段(1945~1970年代)，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被重塑。核心国家开始更积极地使用公共权力，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实施福利政策、调控经济周期来缓和阶级矛盾、保障私人资本积累。国家权力介入再生产领域，通过养老金、家庭津贴等方式承担部分再生产责任，在一定时期内有效缓和了生产与再生产的冲突。自然被纳入政治监管范围，对石油化工等行业的污染进行调控，但这种调控往往以向边缘地区转移环境负荷为代价。曾受殖民统治的国家实现了政治独立，部分少数族裔群体随后进入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形成“既被剥削又被征用”的混合主体。然而，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并未消除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财政危机、社会抗议的集中爆发宣告了这一积累体制的终结。

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1970年代至今)，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再度调整。超国家的金融机构取代国家成为全球经济的仲裁者，主权国家失去对本国货币的有效控制，被迫接受国际资本施加的紧缩政策。社会再生产空间被挤压到极限——公共服务削减、工资增长停滞、双职工家庭成为常态，照护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自然被纳入金融化监管模式，碳排放许可、碳抵消、环境衍生品等投机手段介入生态治理，生态殖民主义以更隐蔽的方式深化。征用日益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驱动，掠夺性债务成为剥夺普通民众的新手段，剥削/征用的混合体开始成为普遍现象。

弗雷泽对资本主义四阶段的历史考察，揭示了制度性分离的动态演变规律。每一种积累体制都试图应对前一阶段爆发的危机，却无一例外地引入新的矛盾，最终导向新的危机。这一历史叙事表明了资本主义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其制度性分离的内生张力，因为经济前台对非经济背景的依赖与否认，构成了其无法摆脱的“衔尾蛇”(ouroboros)困境——资本在吞噬自身赖以生存的基础的过程中，终将自食其果。

5. 边界斗争与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弗雷泽对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分析，最终服务于对解放政治的理论构想。她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分离构成多重统治的根源，那么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就必须超越单一维度的阶级斗争，转向一种扩展的斗争视域——这就是“边界斗争”(boundary struggles)概念的提出。

边界斗争是指发生在经济与非经济领域交汇点上的冲突。当资本的积累逻辑试图突破既有边界、侵入并殖民化社会再生产、自然、公共权力等领域时，那些被侵犯领域的主体就会起而反抗，捍卫原有的边界。弗雷泽借鉴波兰尼对“双向运动”的分析，但对其进行了重要修正。她强调边界斗争并非单纯的市场扩张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对抗，而是涉及更为复杂的多重逻辑——不仅有市场的商品化逻辑，还有再生产的关怀逻辑、生态的可持续逻辑、政治的民主逻辑等。每一种背景领域都有其独特的规范性语法，当资本逻辑试图将其同质化时，就会引发相应的边界冲突。

弗雷泽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边界斗争。一种是防御性/肯定性的斗争，旨在击退被认为有问题的干预、入侵或跨越边界的滑动，意图是把边界恢复到原来的位置，隐含了对现有边界划分的默认。另一种是进攻性/变革性的斗争，则是对现有边界的存在本身、边界的特征或边界的制定过程的彻底否定，意图改变这种边界划分的深层结构，甚至完全废除边界。这两种斗争的区分，为评估不同社会运动的解放潜能提供了分析工具。单纯的防御性斗争可能陷入保守的怀旧，而真正的变革性斗争则指向边界的重构。

边界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是弗雷泽理论建构的核心关切之一。她拒绝将二者视为相互排斥或可以简单替代的关系，而是主张一种“双重视角”的分析方法。一方面，阶级斗争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具解放潜能的冲突形式——它指向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和阶级权力的反抗。另一方面，阶级斗争无法涵盖无酬劳动、生态榨取、种族征用等非经济领域的冲突形式。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恰恰是通过制度性分离将不同的统治轴线编织在一起，因此解放政治必须同时关注阶级、性别、种族、生态等多个维度的斗争，并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弗雷泽强调，阶级斗争与边界斗争的区别是分析性的——在现实的社会冲突中，二者往往相互缠绕，批判理论家的任务就是辨识它们如何交织、如何相互强化或削弱。

针对如何规范性地评估边界斗争，弗雷泽提出了三条标准。第一，非统治原则。任何修改制度性边界的提议，如果会强化或加剧资本主义的支配关系，从规范上讲都是不可接受的。第二，功能可持续性原则。关于边界的提议必须能够以制度化的方式被建立起来，并且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可持续的稳定，避免重蹈资本破坏自身基础的覆辙。第三，民主原则。边界的划分必须使参与者能够对其进行反思、质疑并在必要时做出修改，将边界问题提升到集体自决的层面。这三条标准既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结构性非正义的批判，又为社会变革提供了规范性定向。

基于边界斗争的视角，弗雷泽对 21 世纪社会主义进行了扩展的想象。她认为社会主义不能仅限于克服阶级剥削，还必须克服生产与再生产、人类与自然、经济与政治、剥削与征用的制度性分离。第一，社会主义必须扭转当前领域的优先次序——将培育人民、保护自然和民主自治提升到比效率和增长更高的位置。第二，社会主义必须使社会剩余的配置民主化——通过集体决策而非市场规律来决定如何处理剩余的产能和资源。第三，社会主义必须重新定位市场的作用——在顶层(社会剩余的分配)和底层(基本需求的满足)没有市场，但在中间地带可以容纳市场社会主义、合作社、公社等多种实验形式。这一社会主义构想的核心，是以新的、民主的方式重新划分经济与非经济的边界，使曾经被资本贬低和否认的背景条件真正走到前台。

6. 弗雷泽批判理论的贡献与内在限度

弗雷泽对资本主义的结构阐释，在批判理论的发展谱系中占据独特位置。她的理论努力既是对传统批判理论宏大叙事的复兴，也是对当代左翼碎片化政治的有力回应。客观评鉴其理论贡献与局限，对

于深化资本主义批判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贡献来看，弗雷泽的工作首先体现为对批判理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复兴。自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之后，批判理论日益转向独立的道德、政治或法律哲学研究，放弃了传统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本身的系统性把握。弗雷泽通过复杂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发展了一种以资本主义危机批判为核心的社会批判理论，兼顾阶级与地位、再分配与承认、文化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叙事”，为在当代推进反资本主义斗争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其次，弗雷泽通过对制度性分离的揭示，拓展了我们对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解。她有力地论证了资本主义不仅是经济制度，更是涵盖性别、种族、生态、政治等多重轴线的统治秩序，从而为理解当代社会冲突的多维性提供了分析框架。再次，弗雷泽的边界斗争理论，为整合分散的社会运动提供了理论平台。通过阐明不同领域的斗争如何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她揭示了看似各异的诉求之间的内在关联，为构建反资本主义的统一阵线提供了可能。

然而，弗雷泽的理论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局限。首先，其理论存在“去经济化”的风险。弗雷泽所运用的“前景——背景”式方法虽然看上去把社会再生产、自然生态、政治权力等与经济条件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但其实在批判中对经济结构的根本性驱动力进行了相对弱化，“看似要全面解决社会矛盾，实际上弱化的对资本主义最核心要素即经济关系的批判力度。”^[8]弗雷泽声称其批判理论重回马克思，但脱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批判理论本质上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这就使得弗雷泽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有着本质区别。“弗雷泽的危机理论是一种‘新马克思主义’式的危机理论，本质上与近年来资方左翼激进主义理论中以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和哈维为代表的‘空间危机论’、以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为代表的‘生态危机论’、以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为代表的‘消费危机论’等一致，都是在经济领域之外寻找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源”^[9]。其次，弗雷泽的理论内部存在论证不严谨的缺陷。她在构建经济前台与非经济背景的结构性关联时，并未充分解释为何选取再生产、自然、政治和种族作为资本主义的非经济背景条件，也未能阐明这四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也就是说，弗雷泽的阐释逻辑存在“反向溯源”的经验主义倾向，她坚持的是一种“齐头并进”的集成方式，而非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中推导出这些维度的必然性。最后，弗雷泽的危机理论更多地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对实现路径的具体构想尚显薄弱。她虽提出“顶端无市场、底端无市场、中间可能有市场”的社会主义构想，但对于如何从现实资本主义过渡到这种社会形态、需要什么样的主体力量和政治策略，并未提供充分说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来弥合。

7. 结语

面对资本主义的持续动荡，“批判理论必须捍卫全面性、综合性、纲领性思想的可能”。南希·弗雷泽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探索替代性社会秩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在资本主义日益显露其“食人”本质的今天，弗雷泽的理论提醒我们，批判资本主义必须首先理解资本主义——不是理解其局部，而是理解其整体；不是理解其表象，而是理解其隐藏的居所。超越资本主义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通过边界斗争和解放联盟，我们可以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可持续、更加民主的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820.
- [2] Fraser, N. (2022) *Cannibal Capitalism: How Our System Is Devouring Democracy, Care, and the Planet—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Verso, 11.
- [3] Fraser, N. and Jaeggi, R. (2018) *Capitalism: 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 Translated by Brian Milstein. Polity

Press, 10-15.

- [4] 南希·弗雷泽. 食人资本主义[M]. 蓝江,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 [5]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48.
- [6] 黄其洪, 兰璐. “前台”与“背景”的制度性分离——论南希·弗雷泽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构性阐释[J]. 学术研究, 2024(10): 15-22+177.
- [7] 杜宛玥, 郭丽双. 关于资本主义的三重诘问——论南茜·弗雷泽的资本主义批判新语[J]. 求是学刊, 2022, 49(1): 14-22.
- [8] 王贵贤. 论弗雷泽和耶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19, 5(4): 110-119.
- [9] 陈良斌. 南希·弗雷泽的资本主义危机新论[J]. 国外理论动态, 2019(10): 106-116.